九州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
Kyushu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

漢唐之際的國語學

劉, 三富
九州大学外人教師

https://doi.org/10.15017/9749

出版情報：中国文学論集. 12, pp.66-83, 1983-12-31.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
バージョン：
権利関係：

漢唐之際的國語學

劉　三　富

國語是上古時代一部重要的史籍，又名春秋外傳，亦名春秋國語，甚且合稱爲春秋外傳國語，但也有簡稱爲「外傳」的。這部史籍，大體而言，中國學者肯它定是成書於先秦的。它是中國第一部載錄邦國成敗、名人嘉言、陰陽律呂、天時人事以及逆順之數的記言史籍。在它所存留的豐富史料之中，學者可以察知成敗興亡的軌迹、神道設教的立論，修德進業的方法，明哲睿智的定義；同時更可以理解建國治民的準則、立身處世的藝術，以至於春秋各國風土人情、典章制度的沿革和不同。這眞是一部「包羅天地、探測禍福、發起幽微、章表善惡」（韋昭國語解敍語）的鉅構。

國語，相傳是左丘明在撰作完成春秋左氏傳之後，一方面由於失明，恐懼成爲社會的廢人①；另方面亦因爲左氏傳刪餘的資料很多②；於是乃發憤採擷自周穆王十二年（西元前九〇九年）以至周定王十六年（西元前四五三年）這五百四十年間，發生在周、魯、齊、晉、鄭、楚、吳、越八國的重大史實，予以融鑄剪裁，擇要而錄，終於成就這部又名

① 語本司馬遷報任安書：「左丘明無目、孫子斷足、終不可用。」詳見漢書卷六十二、司馬遷傳。

② 語本班固司馬遷傳贊：「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、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傳、又纂異同爲國語。」詳見漢書卷六十二。

「春秋外傳」③的最早國別史。雖然，它並不如尚書、左傳那樣幸運地厠身於「經部」，甚至亦不如史記、漢書一般堂皇地被視作是「正史」；但由於它記敍生動、文筆閎肆、加以史料豐富，體屬始創，仍然受到後世學者的普遍敬重，幾乎亦是一般士子必讀的典籍。

然而，寖假至於中唐古文運動興起以後，柳宗元子厚竟有「非國語」專著針對國語大加撻伐。子厚認爲它「文勝而言尨，好詭以反倫，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，咸嗜悅焉，伏膺呻吟者，至比六經，則溺其文必信其實，是聖人之道翳也。」（子厚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）所以要「黜其不減，救世之謬」（引同上）！於是自子厚非國語行世之後，國語的身價和存廢問題，無疑地要受到强烈而嚴重的挑戰！筆者近數年來，卽就此一問題作深入地鑽研，預期在不久的將來，會有完整而周詳的論著以就正於讀者。

本文原係研究國語與非國語專著中的一章，主要目的在探研國語自秦火後、以至子厚前發展流傳的情形，一方面用明國語在學術界所居地位之高下；另方面亦以理解子厚之所以要「非」國語的原因。但筆者才疏學淺、加以倉促付梓，紕漏闕畧在在難免，尙祈高明指正，以爲他日改進之借鏡也。

（一） 西漢的國語學

1. 賈誼（西元前二〇〇——前一六八年）④

③ 最早稱國語爲「春秋外傳」的是班固漢書卷二十一、律曆志。

④ 賈誼傳記請參見史記卷八十四、漢書卷四十八。

自秦火以後，最早稱述國語的是西漢文帝時代的賈誼。韋昭國語解敍云：

遭秦之亂，幽而復光，賈生、史遷頗綜述焉。

不過，在今見史記、漢書的賈誼傳中，以及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賈長沙集裏，已經都無法舉出「賈生頗綜述焉」的具體證據；反倒是在「賈子新書」中可以獲得佐證。如：

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：「我欲大城陳、蔡、葉與不羹⑤，賦車各千乘馬，亦足以當晉矣！又加之以楚，諸侯其來朝乎？」范無宇曰：「不可。臣聞：大都疑國，大臣疑主，亂之謀也。都疑則交爭，臣疑則並令，禍之深者也。今大城陳、蔡、葉與不羹，或不充，不足以威晉；若充之以資財，實之以重祿之臣，是輕本而重末也。臣聞尾大不掉，末大必折，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？然終爲楚國大患者，必此四城也。」靈王弗聽，果城陳、蔡、葉與不羹……。（賈子新書卷一、大都）

賈子這一節文字所引述的史實，就是略略變易國語、楚語上第六則「靈王城陳、蔡、不羹，使僕夫子哲問於范無宇」而來。又如賈子新書卷五、傅職篇云：

或稱春秋，而爲之聳善而抑惡，以革勸其心。敎之禮，使之上下之則；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，以馴明其志；敎之樂，以疏其穢而塡其浮氣；敎之語，使明於上世，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。敎之故志，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；敎之任術，使能紀萬官之職任，而知治化之儀；敎之典訓，使知族類疏戚，而隱比馴焉。……或明惠施以道

⑤ 國語卷十七、楚語上：「靈王城陳、蔡、不羹」並無「葉」城。今人祁玉章氏更據左昭十一、十二年傳、史記楚世家證其爲衍文。詳請參閱賈子新書校釋一二六頁。

之忠，明長復以道之信，明度量以道之義，明等級以道之禮，明恭儉以道之孝；明敬戒以道之事，明慈愛以道之仁，明閒雅以道之文，明除害以道之武，明精直以道之伐，明正德以道之賞，明齊肅以道之敬……左右前後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，總威儀以先後之，攝體貌以左右之，制義行以宣翼之，章恭敬以監行之，勤勞以勸之，孝順以內之，敦篤以固之，忠信以發之，德言以揚之……。

也是出自國語、楚語上第一則「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。……問於申叔時」，叔時所作的回答語。此外，像賈子新書卷十、禮容語下所載「晉之三卿郤錡、郤犨、郤至，從晉厲公會諸侯于加陵」一大段文字亦是省簡國語周語下第一則「柯陵之會，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……」[6]而來。

凡此都足以證明賈生多採國語典故的事實，已不煩詞費了。然則賈誼是西漢初年第一大儒，「通達國體，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」[7]，而於國語援引的事例，即可見他重視、珍愛的程度。這對當代，以至後世學者自有相當啓導的作用。

2. 司馬遷（西元前一四五——前八六年）

當然，大量採擷、迻錄國語史實，而且影響後世最爲深遠的則是太史公記了。司馬遷著史記，雖晚於賈誼時論七十年（前一七四——前一〇四），但他是秉持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的旨趣發憤撰述有史以來的第一部通史而「思垂空文以自見」[8]的。因此在「罔羅天下放失舊聞」[9]的態度和做法上就不同於賈生——歷史最重「信而

⑥ 原文詳請檢閱國語卷三、周語下。

⑦ 語見漢書卷四十八、賈誼傳。

⑧ 語見漢書卷六十二、司馬遷傳。

⑨ 語見史記卷一百三十、太史公自序。

有徵」，那就必須「采經摭傳⑩」說明出處；既以取信於人，亦便於驗證也。史記自言采摭國語的例證很多。如：卷一、五帝本紀贊曰：

學者多稱五帝，尚矣！……予觀春秋、國語，其發明五帝德、帝繫姓、章矣！

又如：卷十四、十二諸侯年表曰：

……於是譜十二諸侯，自共和訖孔子，表見春秋、國語，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。

這都是史遷直接說明「國語」乃其引用的主要資料。至於史記中完全逐錄「國語」的原文的，如周本紀所載：

穆王將伐大戎，祭公謀父諫曰：「不可。先王耀德不觀兵。夫兵戢而時動，動則威；觀則玩，玩則無震。是故周文公之頌曰：『載戢干戈，載櫜弓矢。我求懿德，肆于時夏，允王保之。』先王之於民也，茂正其德而厚其性，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，明利害之鄉，以文修正，使之務利而避害，懷德而畏威，故能保世以滋大。昔我先王世后稷，以服事虞、夏。及夏之衰也，棄稷不務，我先王不窋失其官，而自竄于戎狄之間。不敢怠業，時序其德，纂修其緒，修其訓典，朝夕恪勤，守以敦篤，奉以忠信。奕世載德，不忝前人。至于文王、武王，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，事神保民，無不欣喜。商王帝辛，大惡於民，庶民不忍，訴戴武王，以致戎于商牧，是故先王非務武也，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。夫先王之制，邦內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衞賓服，夷蠻要服，戎翟荒服。甸服者祭，侯服者祀，賓服者享，要服者貢，荒服者王。日祭、月祀、時享、歲貢、終王。先王之順祀也，有不祭則修意，有

⑩ 同註⑧

不祀則修言，有不享則修文，有不貢則修名，有不王則修德，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。於是有刑不祭，伐不祀、征不享、讓不貢、告不王。於是有刑罰之辟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討之備，有威讓之命，有文告之辭。布令陳辭而又不至，則增修於德，(而)無勤民於遠。是以近無不聽，遠無不服。今自大畢、伯士之終也，犬戎氏以其職來王，天子曰：『予必以不享征之，且觀之兵。』(其)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？吾聞(夫)犬戎樹敦，率舊德而守終純固，其有以禦我矣！」王(不聽)遂征之，得四白狼、四白鹿以歸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(史記卷四)

將這六百餘字的一段史實，對照國語周語上第一則「穆王將征犬戎」所載，除了少數( )中的古今字、介系詞或省減者之外，幾乎可以稱得上「原文照抄」了。史記中像這樣的例證很多，就是在同卷同紀裏，尚有「共王游於涇上」，「(厲)王暴虐侈傲，國人謗王」[11]等各節，以及晉世家、伍子胥列傳等多篇部份史實都是謄錄自國語。爲省贅重，也不遑一一徵引了。

以上說明了國語是司馬遷撰述史記時的一部重要參考典籍，但並不意味國語一書中所有的史料全爲史遷所用；因爲史記是一部通史，他要「馳騁古今，上下數千載間。」[12]既不能詳於某一古代，亦不能專主某一古籍，然而在敍述西周中期之際，祇有國語可據，當然不避採錄；及至春秋以後，資料既多，也就博採衆家，融貫綜述了。於是「一件事情已經在左傳、在國語中出現過的，史記就不再詳錄。」[13]所以儘管史記淵源國語甚多，但亦不害國語之爲國語，史記之爲史記了。

⑪ 詳請參閱史記卷四、周本紀；國語卷一、周語上。

⑫ 同註⑧

⑬ 語見名著與名人一〇四頁。

史記對後世文士學者所曾產生的影響是世所習知的，但他不僅綜述迻錄了一些國語中的史料，成爲那一時代的具體形象，而且又首先提出國語作者及其撰作動機，影響後世至深且遠。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：

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。（卷一百三十）

這八個字很簡扼地說出：左丘明是在失明以後，才著成了國語。因此，他在報任安書裏除了重複太史公自序中這一段「聖賢發憤之所爲作」的名單和作品外，緊接著又說：

及如左丘明無目，孫子斷足，終不可用，退論書策以舒其憤，思垂空文以自見。僕竊不遜，……亦欲……成一家之言。（漢書卷六十二、司馬遷傳）

可見在太史公的認知世界裏，左丘明是因爲「無目」而「終不可用」，但又「疾沒世而名不稱」⑭，所以就「退論書策」著成國語的；然則史公在「刑餘」之後，自覺「已虧形爲掃除之隸」⑮「終不可用」了；左丘明、孫子並未因殘疾而「名摩滅」⑯，那麼司馬遷要在今後完成史記的願望亦並非不可能了。這段文字不但充分地說明左丘明論述國語的動機，同時也含蓄地表明司馬遷著作史記是追跡前賢的一種「自見」方式。當史記在後世廣爲流佈，成爲史學和文學界巨擘圭臬以後，對國語的流傳自有相當地助益，而後人對左丘明著國語的事實，迄至於李唐之世都無異辭；則其影響之深遠亦可想見了。

3. 劉向（西元前七七——前六年）

⑭ 語見論語衞靈篇。

⑮ 同註⑧

⑯ 同註⑨

國語在西漢，雖曾先後受到賈誼、司馬遷的采摭、重視，但它不是「經書」，自然不能被列爲學官，利祿之途未開，身價也難以提高，那就不可能有人專攻國語、爲之考校疑訛了。這種情形一直到西漢末年才有所改善。韋昭國語解敍云：

> 及劉光祿（向）於漢成世始更考校，是正疑謬。

劉向考校國語以「正疑謬」的貢獻是受到韋昭肯定的。但不知何以經過他「考校」的「新國語」會有「五十四篇」而原有左丘明著的四語僅祇「二十一篇」[17]？以至衍生出他兒子劉歆（前四五——後二三年）「欲建立左氏春秋……列於學官」而「移書太常博士」[18]的一場今古文之爭？至於近代康有爲、廖平等又高倡「左傳析自國語」[19]如此聚訟難明的千古公案[20]。恐怕絕不是劉向當年校正國語之際，所能料及的。

（二）東漢的國語學

1. 鄭衆（西元前？——八三年）

東漢以後，出現了好幾位訓注國語的學者，韋昭云：

> 至於章帝，鄭大司農（衆）爲之訓注，解疑釋滯，昭晰可觀；至於細碎，有所闕略。

⑰ 「國語二十、一篇新國語五十四篇」係據漢書藝文志卷三十、春秋二十三家所列。

⑱ 事詳漢書楚元王傳。

⑲ 今文家康有爲新學僞經考、廖平古學考、崔適史記探源等都以爲「左傳析自國語」。請檢閱屈萬里古讀籍導頁一八八、可知其大概。

⑳ 請參閱左傳眞僞考。

雖然，鄭衆所訓注的原貌已不可見，而在後漢書本傳中亦未提及曾有注釋國語之事，但一則韋昭是國語學的專家，對前輩注家自較史官了然；再則韋昭早於范曄一百多年，距鄭衆爲近，且評其注「昭晰可觀」，「細碎」「闕略」；則鄭衆國語訓注，爲韋昭所親見之事實，勿庸置疑。

鄭衆既有深厚的家學[21]，且又能「精力於學」，本傳說他是以「作春秋難記條例，兼通易、詩，知名於世」的，同時更由於家法傳承，使他成爲鄭派宗師，那麼他的國語訓注雖不免闕略之弊，但對當代，以至後世的影響則是顯而易見的。

2. 賈逵（西元三〇——一〇一年）

稍晚於鄭衆，而與鄭學爲敵體的賈學宗師賈逵，亦曾訓注國語。韋昭云；

待中賈君（逵）敷而衍之，其所發明，大義略舉，爲已憭矣；然於文間，時有遺忘。

也許正因爲賈逵對國語所作的發明，已經達到「憭」的水準，在後漢書本傳中亦明載：「尤明左氏傳、國語，爲之解詁五十一篇。永平中，上疏獻之，顯宗重其書，寫藏秘館[22]。」如今，我們雖不得見其解詁，但能爲帝王所重，亦可見他對國語原作的流傳與發揚貢獻之大了。

事實上，賈逵是東漢一代「學者宗之，後世稱爲通儒」的經學大師，論其學術傳承，又淵源於家學，本傳云：「父徽，從劉歆受左氏春秋，兼習國語、周官……逵悉傳父業。」專就賈逵的國語解詁而言，至少那是累積了劉歆、

㉑ 後漢書卷三十六鄭興傳云：「興好古學、尤明左氏、周官、長於曆數……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。」同書同卷鄭衆傳云：「衆字仲師、年十二、從父受左氏春秋。」

㉒ 語見後漢書卷三十六賈逵傳。

賈徽和他本人三代的見解與發明，其在當世之已流傳於儒林，自可想見；至於它能垂範後世，雖不免「於文間時有遺忘」之弊，但其於韋昭注國語時的影響則是顯而易見的。不僅如此，即使時至五百年後的唐代學者仍在大量引用賈注㉓，則其影響之深遠，貢獻之偉大，又非數語可盡了。

3. 班固（西元三二——九二年）

在經學家、賈逵訓注國語的同時（約在西元七九年前後），史學家班固雖斷代爲史，專記西漢一朝的興亡，但像國語這樣一部重要的史籍，無論如何是不會被棄置的。他在漢書卷三十三，經籍志㈠曾說：

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，以記言之。後世多務，其道彌繁…。春秋、國語引周志、鄭書之說，推尋事跡，似當時記事。

又在司馬遷傳贊曰：

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，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，又纂異同爲國語。（漢書卷六十二）

於是這「似當時記事」的國語，在班固筆下，竟然成了左丘明爲春秋作「傳」之後的副產品——祇是「纂異同」地補充「春秋傳」史料之不足罷了。那麼，班固要將國語視作爲「春秋外傳」也倒是順理成章的事。漢書卷二十一、律曆志㈠下「世經」云：

——顓頊帝　春秋外傳曰：「少昊之衰，九黎亂德；顓頊受之，乃命重黎。」

——帝嚳　春秋外傳曰：「顓頊之所建，帝嚳受之。」

㉓ 詳請參閱張以仁著左傳國語論集頁一七十二。班固傳記請參見後漢書卷四十上、下。

所謂「春秋外傳曰」，前者見於國語卷十八、楚語下，第一則；後者見於卷三、周語下，第七則。然而，遍尋班固編纂當時全國圖書目錄大全的漢書藝文志卻不見「春秋外傳」一書，在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中，有的是：

——國語二十一篇　左丘明著。

——新國語五十四篇　劉向分國語。

書篇之下，亦卽各書的作者，乃是班固所自注㉔，可見他心目中丘明的國語和劉向的新國語是有所分別的。同時，也從而證明國語之所以成爲「春秋外傳」則是班固的自我作詁。這一點非常重要，而且影響後世也很大，讀者如能細加體認，則於左傳和國語之間的種種糾纏，自能有一淸明而近眞的理解；爲省贅重，筆者不擬再就此一問題多所辭費。至於漢書引據國語的例證也不遑多敍了。

4. 許愼（西元五五——一四九）

國語在東漢中期以後，普遍受到學者重視的例證，除上述史學家班固外，那位「五經無雙許叔重」㉕的中國字典學權威——許愼——在其所撰說文解字十四篇中，已經將國語原文運用到「解字」之上了。例如：

說文卷十七石部「砮」字解有云：「國語曰：肅愼氏貢楛矢石砮。」（魯語下）

卷五言部「誶」字解有云：「國語曰：誶申胥。」（吳語）

卷一玉部「珠」字解有云：「春秋國語曰：『珠足以御火災』是也。」（楚語下）

㉔ 漢書藝文志是承襲劉歆七略而來、祇有自注始能表現班固的意見。

㉕ 許愼傳記請參見後漢書卷七十九下儒林傳。

卷七鳥部「鸞」字解有云：「春秋國語曰：周之興也，鸞鵞鳴於岐山。」（周語上）就是很好的證明。

當然，國語未必因爲許愼的徵引始不致淹沒無聞，但國語由於說文解字的流佈而更擴大其影響力與重要性，則是不容置疑的。

事實上，國語經過東漢碩學通儒的爬梳校刊，詮釋訓詁之後，可讀性增高，自然受到士林的賞愛；另方面又加上史學家的比附經傳、採摭徵引，可信度增強，無疑是今古文學者所爭讀的典籍。因此，許愼在說文解字中也已視之要籍古典，而予援引。筆者以爲：東漢一朝才眞是國語發皇生輝的黃金時代。它的價值，它的流傳都在這個時代被肯定、被擴大了。

（三）曹魏的國語學

1. 王肅（西元一九五——二五六）

東漢以後是三國鼎立的時代，就國語學的發展而言，他是相當重要，而且必須分別說明的。若從政治主流考察，自然仍以那累世權重於漢室，由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所建立起的魏國爲中心。事實上，無論在政治、文化、疆域、學術……等方面，曹魏都能賡續東漢、成爲天下的重心。如果國語不見流傳，自然是匪夷所思的；但要說到受重視，則當有知名學者爲之用力的證據，始能成立。在韋昭國語解敍裡，後人無從覺察魏國究竟有誰曾爲國語的傳布盡力，然而筆者卻發現了那位以孔子家語聞名後世的王肅就曾作過國語注。三國志卷十三、王肅傳有言：

初，肅善賈（逵）馬（融）之學，而不好鄭（玄）氏，采會同異，爲尚書、詩、論語、三禮、左氏解，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，皆列於學官。……及作周易、春秋例、毛詩、禮記、春秋三傳、國語、爾雅諸注，又注書十餘篇。

可見王肅在當代中原人文薈萃之地是首屈一指的經學大師，而他更是以注經傳的態度來注國語的。這對國語在學術界的地位，自有相當重大的幫助了。至於晚出的韋昭在解敍國語時不曾提及王肅注國語一事，想來必然是涉及政治立場問題，似乎無須多作考勘。王肅的國語注雖不能流傳東吳，但卻可以流傳後世；在隋書經籍志（卷三十三）裡仍有王肅撰「春秋外傳章句一卷」的載記，亦可見其影響了。（隋書經籍志所列是否即三國志所說的國語注？以非本文主旨，不贅；後日當專文考按。）

（四）東吳的國語學

1. 虞翻（西元一七二——二四一）和唐固（西元一五五——二二五）㉖

承襲東漢熱烈研究國語風尚的是三國時代雄踞江東的吳國。韋昭國語解敍云：

建安、黃武之間㉗，故侍御史會稽虞君，尚書僕射唐君皆英才碩儒、洽聞之士也；采摭所見，因賈（逵）爲主而損益之。觀其辭義，信多善者，然所理釋，猶有異同。

虞翻、唐固都是當代名重位高，卓然自樹的大學者，或「講學不倦，門徒常數百人」㉘，或「講授常數十人」㉙，國語經他

㉖ 虞翻傳記請見三國志卷五十七、虞翻傳。唐固傳記史無專載；僅三國志卷五十三、闞澤傳末神有數語可供參考。
㉗ 建安爲東漢獻帝年號、起迄爲西元一九六—二一九年；黃武爲三國吳主孫權稱帝前的年號、起迄爲西元二二二—二二九年。
㉘ 語見三國志卷五十七、虞翻傳。
㉙ 語見三國志卷五十三、闞澤傳末所坿唐固略傳。

們訓注講授之下，自然得到充分的傳布和發揚了。不過，他們的國語注雖至唐初仍能分別流傳，但因「所理釋，猶有異同。」那就不得不有待於集大成者爲之整齊綜合了。

2. 韋昭（西元二〇二——二七三年）

果然，在虞翻、唐固廣爲傳佈發揚的基礎下，吳國產生了最偉大的國語學者，那就是「篤學好古，博見羣籍，有記述之才」[31]的韋昭。

韋昭行輩晚於虞翻和唐固，但他的國語注問世以來，一直流傳至今，成爲定本。此後凡研習國語，採摭國語而涉及注釋者，無不奉爲圭臬！他曾自言作注意旨云：

> 昭以末學，淺闇寡聞，階數君之成訓，思事義之是非，愚心頗有所覺。今諸家並行，是非相貿，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，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袪過。切不自料，復爲之解，因賈君之精實，採虞、唐之信善，亦以所覺，增潤、補綴；……去非要，存事實，凡所發正，三百七事，又諸家紛錯，載述爲煩，是以時有所見，庶幾頗近事情，裁有補益，猶恐人之多言，未詳其故，欲世覽者必察之也。

如此一部「增潤補綴」「去非要、存事實」的集大成注本，自然要凌越衆家，嘉惠士子了。因而，韋昭之成爲國語注家的權威，要獨擅後世，也是事理所必然的了。不過由於韋昭國語注今仍傳世，讀者人人可得而知其影響之大、傳布之廣，自不待筆者多所贅辭了。

㉚ 請參閱唐人魏徵等編纂的隋書卷三十三、經籍志。

㉛ 韋昭、三國志因避諱改「昭」作「曜」、卷六十五有傳。

（五）兩晉的國語學

1. 郭璞（西元二七六——三二四年）

三國鼎立的局面前後維持了六十年，就被司馬氏的西晉所統一，而王肅則是西晉開國皇帝——武帝的外祖父，他開啓「反鄭學運動」[32]，造成了經學的混亂，同時他更藉著帝王的威勢，將王肅的尚書、詩、論語、三禮……都立於學官。國語學在兩晉百餘年間，可能連韋昭注都不得見。不過，我們在郭璞的爾雅注中卻發現了國語流傳的證據。例如：

國語曰：詢于八虞，咨于二號、度于閎夭，謀于南宮、諏于蔡原，訪于辛尹，通謂謀議耳。（釋詁第一）

國語曰：其妻饁之（同上）

國語曰：且觀之兵（釋言⑬二）

國語曰：吾聞之先姑（釋親第四）

郭璞是晉室東渡的名士，「亦以才學見重」於明帝[33]。他的卜筮精確，時人歎服，游仙之詩，蜚聲後世，自是當代朝野所注目的人物。國語能受到他的徵引，在經學紊亂的時代中，確實令人有種空谷足音的喜悅啊！

2. 孔晁（？——？）

兩晉除郭璞以外，國語的專家，我們在隋書經籍志裡還可以看到：

——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晉五經博士孔晁。

㉜ 詳請參閱楊東蓴中國學術史講話第五講自然主義的特盛、經學及其他（盤庚版一八六頁）。

㉝ 語見晉書卷七十二郭璞傳。

然而，孔晁的注本，今已亡佚；孔晁的大名，不見史料，筆者亦祇有列之如上，聊具一席罷了。

近人楊東蓴曾以爲：「中國在魏、晉、南北朝時代，固有的儒學，銷沉達於極點，除了老、莊思想的猖披，學術界差不多成了殭凍狀了態。」[34]在這三百六十年（二二〇——五八三年）中，國語韋昭注能被流傳下來，已屬萬幸了、事實上，國語經過韋昭集大成地注釋以後，再經政局變動的結果，韋注之能廣泛傳佈，已無庸多慮。因而此後學者再也難以凌駕，於是韋注的地位確立了，國語學已步入了傳播的境域。

（六） 唐代中期以前的國語學

1. 魏徵（西元五八〇——六四三年）

國語流傳到初唐已確定了它「春秋外傳」的身分，而它的地位亦已晉升到經部之中。這一事實，可從魏徵等人編撰的隋書經籍志（卷三十二）得到證明。經籍志「經」部「春秋類」裡有：

——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六卷賈逵注

——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虞翻注

——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

——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注

——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晉五經博士孔晁注

㉞ 語見中國學術史講話、第六講佛教的輸入及其在中國的發展與影響、概論（盤庚版一九五頁）。

——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唐固注

六種注本同時流傳到魏徵手中用以編撰隋書（六二二年）。在右列書目裡，劉向的新國語五十四篇已經亡佚；而左丘明所著的二十一篇國語，乃有賈、虞、唐、韋等家的注本；雖在卷數上各有歧異，書名上又多出了「春秋外傳」四個大字；但這都是一些枝節問題，既無害於國語的內容，亦無妨於國語的流傳，筆者不擬深論。

不過，正因爲唐人視國語爲春秋外傳，所以它的身價和地位才得提高，才會被安排在經籍志的「經」部春秋類裡，而國語之爲士子所必讀，於焉亦可得一明證。這對國語的流傳自有相當重大的影響。

2. 劉知幾（西元六六一——七二一年）

劉知幾撰作史通論述古典史籍時，就將國語獨立標擧爲「國別史」的源頭，而名之以「國語家」，下統戰國策、孔衍春秋後語、司馬彪九州春秋等；他在史通如是云：

古往今來，質文遞變，諸史之作，不恆厥體，榷而爲論，其流有六：一曰尚書家，二曰春秋家，三曰左傳家，四曰國語家，五曰史記家，六曰漢書家。今略其義，列之於後……

……國語家者，其先亦出於左丘明。既爲春秋內傳，又稽其逸文，纂列別說，分周、魯、齊、晉、鄭、楚、吳、國事，起自周穆王，終於魯悼公，別爲春秋外傳國語，合爲二十一篇。其文以方內傳，或重出而小異。然自古名儒賈逵、王肅、虞翻、韋曜（昭）之徒，並申以注釋，治其章句，此亦六經之流，三傳之亞也。……（史通卷一、六家）

這是很典型、很精賅，而且也很完整的介紹性文字。這段文字綜合了由西漢司馬遷以迄於盛唐劉知幾近九百年（前一

〇四——七二一年）間學者對國語的種種認知；特別是「六經之流，三傳之亞」的評價更能充分反映出唐代學者遠紹漢書藝文志的軌迹。

劉知幾是位研究古代史籍的專家，他祇是從史學的整體性檢討國語的地位，然而卻非專門鑽研國語的學者，他能作綜括性的說明來肯定國語的價值，但卻無法深入國語尋求出她的闕失，矛盾以及其它種種問題。於是，國語所存在的瑕疵，就有待於後世具有敏銳觀察力，而又深入摩勘國語的學者去從事汰沙存金的工作了。至於，這位候之久，而又能獨具慧眼的學者在劉知幾卒後半世紀方始出現——那就是以古文宗師享譽萬代的柳子厚！